实用主义的胜利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读书报告

1. 一些直观上的感受

傅高义先生的《邓小平时代》无疑是一本极好的传记，同时也记录了一段历史。阅读起来难免会让人联想起司马迁的《史记》，即以人物为核心，聚焦于具体事件，在表现任务的同时反映历史。

虽然读之生动有趣，但是我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总感到一点点酸气，这当然是我个人的主观感受，不过作者在力图保证材料的客观公允的同时，偶尔会流露出一种“这个人/这个国家，怎么就做成了我们认为他们做不到的事”的不解乃至于嫉妒。这种情绪在书中记述中英香港谈判，西藏问题的解决，以及对于中俄领导人的对比中流露的较为明显。

这难免和作者美国学者的身份有关——建国后长期以来，我们的国家被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实为落后而封闭的专制国家，然而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又另他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所谓的落后专制的制度是适合我国且具有巨大优越性的。这自然让他们戚戚然。

我们的祖辈与父辈曾经经历了一个疯狂的年代——政府并不在意人民生活水平如何，仅仅因为虚无缥缈的意识形态的对立而剑拔弩张甚至于怂恿代理人大打出手。国际上如此，国内亦如此——各种激进的政治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精神的力量被无限放大，而人生活在世界上的物质追求被无限贬低。不客气的说，这种疯狂近似于二战期间的日本。最令人后怕的是，那个时代距今并不遥远——我的祖母跳过忠字舞，我的父亲曾在1989年走上街头，我的表兄出生于红色帝国解体的1991年。

我们研究国内问题时，不可把目光局限于国内。在那个年代，似乎全世界都感染了某种疾病，在大洋一端的人民对于在大洋另一端的人民怀揣莫名的恐惧，尽管他们可能一生不会有交集。巨大的阴影笼罩着所有人，这阴影，有人叫它帝国主义，有人叫它修正主义。人类在自己所制造出的歇斯底里的气氛中颤抖，理性的思维被莫须有的梦魇卡住了脖子。在这种环境下，有人能够理性的思考问题，十年如一日的等待解决问题的机会，并最终以坚定的意志执行自己多年来的计划，这种人可以成为伟大，没错，我说的就是邓小平同志。

多年后我们回顾那段荒唐可笑的历史，我们曾像堂吉诃德一样，对着各种主义的风车挥舞着骑枪，却忽视了脚下的土地。

是什么让我们曾经对这些风车如此着迷呢？答案不应该是某种事物，而是认识事物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我们称之为形式主义，而邓小平执政以来的一系列成绩，乃至于我党自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甚至是我国几千年的政治成就，都是与之相对应的实用主义的胜利。

在这篇报告中，我将聚焦于实用主义在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应用，这种充满东方智慧的执政经验，值得我们考察。

1. 从毛到邓：实用主义的一贯性

虽然毛主席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犯下了追求形式主义，激进左倾的错误，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在早期中共领导人中，他最重视实用主义。虽然不知是出于何种目的，《邓小平时代》这本书中似乎在有意无意地把毛与邓对立起来，但我们要认识到，二者对于实用主义地应用是一致的，毛晚年的错误，在于他偏离了他自己原本正确的轨道。

自秋收起义开始，毛泽东便开始对于实用主义的应用——农村包围城市是有悖于苏共夺权的经验，但恰恰是最适合我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而毛在第五次反围剿时被排挤，也正是当权的形式主义者对于毛泽东这样的实用主义者的打压。邓小平说他有“三起三落”，毛泽东在建国前的经历又何尝不是坎坷曲折。这是实用主义者所必然承担的，因为形式主义者出于对于教条的维护（也就是对他们统治地位的维护），必然采取对于实用主义者的打压态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毛与邓二人的人生经历有很大相似之处，不过这里就不展开了。

邓小平在政治上的成功，得益于他对于实用主义的坚持。诸如“黑猫白猫”论，“摸着石头过河”等等，他似乎没有长期的计划，而是在推进工作的过程中走一步看一步。同样，毛泽东在建国之前也很善于变通，至于他晚年专断的原因，可能是溜须拍马之人太多，毛主席失去了作为实用主义基础的实践调研的能力——各种放卫星让他很难了解真正的国情。故而得实用主义者成，失实用主义者败。

其实相比较于形式主义，实用主义更加需要政治家对于自己得目标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对于实现目标有明确的计划。比如我们的目的是发展经济，那么就不要纠结于“社”，“资”这样的名份上的琐事。而形式主义是最不动脑子的，照着教条来就好，犯了错大不了把责任推给教条。

我在小时候看党章经常修改，总觉得有损于党章的尊严，长大后再看，其实不然。修改的只是手段，目的却是一贯的。正是采用这种方式，我们的政府才能高效运转，而不是把资源浪费在对于教条的无休止争论以及对于西方某些制度的全盘接受上。在这方面，我国台湾地区，以及泰国等国家，为我们提供了盲目学习西式民主的反面教材，至于美国的选举闹剧，徒增笑尔。

不过美国的选举虽然搞笑，但它在冷战中确确实实击败了苏联，凭借的就是实用主义，放下所谓的意识形态包袱，拉拢一切可以拉拢的（包括我国，虽然在1989年它试图让我们来一次颜色革命），反观苏联，深陷教条主义的牢笼中，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身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最后众叛亲离。

殷鉴不远，我们要坚持既定的目标，特别是在美国对我们围追堵截的当下，不可自乱阵脚，要明确目的大于手段，形式服务于实用，不可本末倒置，重蹈戈尔巴乔夫的覆辙。

1. 手段还是目的

纵观邓小平的一生，虽然大起大落，但是他的目标一直是使国家富强。为了这个目标，他并不纠结于手段。在留学法国时，为了理想可以委身于工厂以换取学费；解放战争最艰难的时候，为了胜利与刘伯承深入敌后，吹响反攻的号角；建国后面对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左倾运动，为了国家的富强与多疑的毛泽东周旋；就算是被下放江西，子女受到迫害，为了改变这一切他选择了隐忍；四人帮被打倒，但是思想的枷锁没有被破除，为此他在政治斗争中取代了华国锋。这中间有何艰难，有何危险，我等布衣难以知晓，不过从我国历朝历史来看，必然是九死一生。

这就是实用主义者的伟大之处：背负别人所不能背负的，实现别人所不能实现的。由于实用主义者不拘泥于教条，他们必然要自己承担执政的责任，换言之，他们不能像本本主义者那样用教条当作自己的挡箭牌。同时，为了最终的胜利，可能会采取一些令人诟病的方法，治理大国尤其如此，因为人口众多，利益关系复杂，即使最终的结果是国家富强，往往也会损害一些人的利益作为代价，因此在改革的过程中可能会采用雷霆手段。

正如斯大林的工业化改革，虽然为了推进工业化，饿死了农民，为了改革的深入他甚至采用不光彩的手段打击异己，但如果没有工业化所取得的成果，苏联很难取得对纳粹的胜利，须知苏联刚刚成立时是带有大量封建残余的落后的农业国。

同样，邓小平在实现他的规划的过程中面临很多指责，无论是改革开放前左倾分子对他的污蔑与批判，还是改革开放后在1989年采取的强力手段引来的国内外的质疑。不论过程如何，我们看到他的路线是最为适合我国发展的。

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先后经历了左倾分子与右倾分子的冲击，但是他总能够化险为夷，在保全自己的同时把那些激进思潮对国家的损失降到最小。

只为国家，无问左右。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不择手段，放弃信仰。但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因为它是社会主义，而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使我国强盛我们才选择它。手段与道路是服务于目的的，万万不可迷失在对于手段的考据之中却忘记了初心。

说一点题外话，邓小平让我联想到《三体》里的章北海。理性，有城府，为了最后的胜利可以采取一些有争议的手段，虽然可能不被人所理解，甚至于背负骂名（由于对于国企利益的冲击，在我的家乡有很多下岗工人迁怒于邓），但这无妨我们这些看到他成就的人为他献上一点敬意。

事实上，早就有人这样做了，不过感谢他，没有狂热的山呼万岁，而是“小平您好”。

1. 妥协的艺术：实用主义的运用

邓小平对于实用主义的运用，可以总结为妥协的艺术。也就是说，什么时候该妥协，什么时候不该妥协；妥协的时候如何妥协，在不能保证自己的所有目的都达到时如何取舍。这些问题都是政治家应该仔细思考的。

邓小平很善于处理以上两个问题。“钢铁公司”的称号可以看出，他在判断为不可妥协的情况下决不妥协，比如香港问题，主权问题不可谈判，当然，这也是建立在如果爆发冲突，付出的代价在我国可承受范围之内。而为了获得西方世界的好感，推进中日关系正常化，进而获得我们急缺的资金与技术，我们搁置了钓鱼岛争议。

至于从大跃进到1978年邓小平为了国家的正常发展，为了国家不那么“左”，所做出的努力，我作为一个读者，在阅读这一段（约占全书一半的篇幅）时，也感觉到疲惫甚至于绝望。

年龄越大，经历的事情越多，越发现邓小平的伟大，在各种势力之间周旋，被领袖怀疑，被同僚排挤，却依然戴着枷锁起舞。妥协，当然是无奈的，但实用主义者会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比如文化大革命末期，邓小平在经济建设上的探索虽然被屡次打断，但他总能够通过妥协，使自己的工作虽然不能进行但也不至于被打断。比如台湾问题，“一国两制”何尝不是一种妥协？收复疆土之功，足以彪炳史册，然而为了中美关系的谈判，为了谈判背后美国对于我们对抗苏联，反击越南（书中称之为“入侵”，我以为很不妥当）的支持，邓小平妥协了。

又比如1989年对于暴动的不妥协，他当然知道，这种行为会被国内的知识分子所反对，会被国际社会视为独裁并加以制裁，但是若不这样做，国家很有可能会陷入更大的动乱，如“阿拉伯之春”。

这种妥协的艺术，从邓小平时代到今天，一直被我国娴熟地运用。当年的韬光养晦，从南斯拉夫大使馆到1996年台海危机，我们一直在隐忍，在妥协，因为那时我们太过弱小，如果逞一时之快，我们发展的势头，或说“国运”，很可能被强敌所中断。

实用主义政治家往往在当时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因为左倾分子认为他“右”，而右倾分子认为他“左”。当然，历史自有公论。

尾声.历史机遇：实用主义在当下

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诚然，当前的我国，面临着巨大的历史机遇，正是因为我们在近四十年来坚持实用主义。而恰恰在这个时候，西方世界或许是承平日久，开始热衷于咬文嚼字，党争内讧，对于我们的压制大大减轻。

但是我们需要警惕。随着人民群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一些半吊子“文化人”对西方的所谓政治正确很是热衷，可他们没学到精髓，只学到了那一套文字游戏，甚至于挂羊头卖狗肉，典型例子即为迷蒙的伪女权。

我们且不可忘记，党争误国，教条误国。西方资本主义搞垮了一个又一个国家，从中渔利。讽刺的是，他们自己并不信他们宣传的那一套，却不遗余力地为他国灌下“民主自由”的迷魂汤。最后似乎把自己也迷惑住了，在阿富汗打了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牵扯了较多精力，无暇顾及我们，我们也抓住机会实现了高速发展。

目前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政府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们开始放弃一些空话大话，开始想办法“让美国再次伟大”，或说，他们正在重拾实用主义，我们因此更不可丢弃实用主义这一有力武器。

其实，邓小平本人也说过，要“实事求是”。

以上，即为我对于《邓小平时代》的阅读报告，或说，对于那个时代的一点感慨。管窥之见，请老师海涵。

隋唯一

2017011430